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权的攫取

陈重耕

(邱北县八道哨中学, 云南 邱北 663200)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 基督教三大教派尤其是新教和天主教依附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的合法权利。西方教会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事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 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 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关键词】 中国近代; 基督教; 传教权; 房地产权

【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303(2003)01-0040-03

The Possession of Modern Missionary Work on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EN Chong-geng

(Ba Dao Shao Middle School, Qiu Bei, Wenshan, Yunnan, 663200)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s, the three great religious sects, especially the protestant and the Catholic, seized the legal right of doing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rough the unequal treaty by force. The facts that the western churches reached their missionary purpose with political ways and the evil actions done by missionaries in China aroused Chinese people great indignation, and resulted in many modern religious cases.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that the Yihetuan Movement took place.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times; Christianity; the right of doing missionary work; the right of real estate

康熙年间因“礼仪之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首开清王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先例; 雍正时期进一步没收教会地产, 禁教更为严厉; 至道光年间, 清王朝的禁教政策由行政命令进一步演化为法律,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新来传教士禁止进入中国, 国人向洋人习教者“拟绞立决”。这样, 基督教彻底地丧失了在中国存在的合法地位。天主教此后的活动及 1807 年秘密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直至鸦片战争以后。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传教士看到在华传教的新希望, 西方教会势力把它看成是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 企图借这场战争“把传教士一直运送到传教国家的心脏”, “使更多的人归依圣教”^{①(179)}。然而, 受英国重商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影响, 在多达九项的《南京条约》中“可以说是

第一次给了外国人以在五处通商口岸自由居住的权力; 然而, 无论是这一条款还是其他任何一款, 都只字未提传教问题”^{②(213)}。但由于传教士主要来自欧洲和本身的多重身份——外交官、旅行家、商人及水手, 根据《虎门条约》享有治外法权, 受英国“一体保护”。仅这一治外法权, 通商口岸的传教士们再也不害怕教难。

传教权、房地产权是外国教会在华传教的前提基础和物质依附, 是伴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而逐步取得的。

首先是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取得习教权、传教权和地产租赁权。基督教传教权在中国近代的最早取得源自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该条约明确规定: “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 或久居, 或暂住, 均准其租赁民房, 或租地自行建楼, 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其雇觅

* 收稿日期: 2002-12-28

作者简介: 陈重耕(1978-), 男, 苗族, 邱北县八道哨中学教师, 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水手……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③(96)}。依此,开放口岸的美国侨民取得在通商口岸的租赁房产、信奉上帝耶稣的条约权利,华人习教成为可能。紧随美国之后,法国通过《黄埔条约》取得等同美国的权利,同时补充“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④(96)}一款,藉此取得中国政府的保教权。《黄埔条约》为英、德、俄、奥及瑞典、挪威等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类似条约创制了范本。此后,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基督教各教派均获得中国政府保护传教的条约权利。

这一缺口的打开,标志着康熙及其子孙奉行了一百二十年的禁教政策逐步松弛、瓦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封闭的门户被迫打开。基督教实现了入华传教的第一步——取得立足点。

其次,是全面弛禁天主教,取得华人习教权和教会的置产权。中美《望厦条约》把宗教问题列入条约内容引起清政府内部的严重担心,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在奏本中“臣等伏思设堂礼拜,夷俗固然,但事属不经,见闻也惑,愚民所喜新厌旧,故难免效尤”,进而提出“应由该督咨商各该抚设法谕禁,不得转相传习,务使沿海居民晓然于夷言之不可效”^{⑤(244)}的陈述,反映了部分官吏对西方宗教侵略的担心和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但法国全权大使拉蓐尼却不给清政府喘息的机会,《黄埔条约》签订后不久,就采用威逼、利诱、恫吓等手段威逼耆英于1844年12月14日上奏道光帝:“……今据弗朗济使臣喇礁呢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行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⑥(26)}。道光帝似被耆英的奏折感动或是被逼无奈,硃批“依议欽此”。按硃批,耆英在回答美国领事质询时表明政府态度:“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⑦(94)},清政府在行政上从此放松对华人习教权的控制。随后,拉蓐尼得寸进尺,无耻要求给还雍正时期没收、封闭的教堂旧址,道光皇帝不得已于1846年2月20日发布第二道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⑧(56)}。耆英接到谕旨后发出告示“晓示天下黎民”。这不但重申被禁一百二十多年的天主教弛禁,让传教士取得华人的习教权;而且满足了拉蓐尼给还天主堂旧

址的要求,使法国传教士和教会取得置产权,有了传教依附。这无疑是给天主教及隐藏着的传教士平反昭雪,使之明目张胆地横行于华夏大地,无所约束。

这样,清政府在宗教宽容原则下完全从行政上满足传教士对弛禁天主教、取得华人习教权及在华置办产业的要求,让传教士达到了第二个目的——让中国人“归依圣教”,为基督教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向内地的扩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依附基础。

最后,是列强取得教会和传教士在内地的传教权和置产权——独自享有,使传教事业深入发展。道光皇帝在两道弛禁上谕中并未许可传教士在中国完全的活动自由,内地仍未对传教士开放,内地官吏仍以《大清律例》中的有关条例为基准,禁止传教士在没有该省督抚的允许下,建造佛塔、庙宇、寺院及教堂。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和咸丰帝继位的影响,制肘了基督教使整个中国基督化梦想的实现,使传教士通过外交谈判达到目的的希望破灭。

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了教会势力扩大在华权利的机会。战争国之一——法国,以“马神甫教案”(又称“西林教案”)为借口发动战争,业已注定这场战争的结果必然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与清政府订立的《天津条约》都有传教特权的条款。法、俄两国明确规定教会和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内地传教,但具有传教传统,注重文化侵略的法国更为详细,法约第十三款明确规定:“凡奉教之人”,“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⑨(695)},另外,在中法《北京条约》(续增条约)中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军民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取得在内地的传教权和清政府的保教权。英、美两国也取得新教的类似保教权,中英《北京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不得刻待禁阻”^{⑩(116)}。其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获得此特权。传教士和教会在内地的传教权、保教权从此成为条约权利。

在订立《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

士利用中国方面无人懂法语的特点,在条约中文本上私自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126)}一句。这句在法文本上是没有的。据中法《天津条约》“所有议订条款,或有两国问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作为正义”^{②(105)},一款,是无效法律效力的。而当时中国官员无知,仅就其中的“各省”字样作交涉,但法国的强硬态度使清政府作出妥协,达成所谓的“柏美德协定”,确认这一特权。房地产成为条约权利。后来,清政府发现作假一事,提出交涉,由于既成事实和法国的不予理睬,也只好不了了之。在这一问题上,英、美等国比较慎重,不愿按一视同仁的政策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占有这一权利。英国政府曾告诫驻华使馆“本国政府不宜不顾利害,专为我国教士坚求天主教所得权利”,“况天主教索得之权利,并无实在根据,只凭中法条约汉文本之窃入字句,故本国政府尤不欲为英教士强求”^{③(269)}。这一态度,使新教在内地的发展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受到影响。

甲午战争之后,英美两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分别获得置产权。1903年,美国又将其变为条约权利:“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④(187)}其后,瑞士等国也获得此权利。

由于房地产问题严重危及中国的国家主权和百姓的切身利益,清政府一开始就力图加以限制,并在任何约章中均未赋予传教士个人拥有置产权,但软弱的清政府却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非法置买私产现象越演越严重,从而流弊横生,殃祸百姓。因此,1928年国民政府颁行《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规定,教会只能租用或租买房屋,以前之买土地者,以永租论。对传教士私置地产也进行限制。将教会地产纳入中国制定的法令和课税的控制之下。^{⑤(468)}使政府对教会在华地产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实际上,受中国内乱影响,却一切如故。

《天津条约》订立后,清政府禁教的底线被彻底推垮,基督教取得在华传教的完全自由。1870年,清政府又删去《大清律例》中的禁教条款,增加了保护传教和信教的新条款,传教权以国内法的形式确认下来,传教士和信徒自此受条约权利(治外法权)及国内法的双重保护。这就让传教士势如破竹地大举进入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内地省份及偏远地区,表面上为传教事业开启了一个“复兴、繁荣”的时代,而实际上却埋下了严

重的传教危机。由于东西文化差异,基督教与儒家文化原本就存有矛盾。从明末的“南京教案”到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就是中西文化矛盾的体现。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优越感,激发了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基督教依附不平等条约达到传教目的的事实和少数传教士及不法信徒以传教、信教为掩护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惹起事端,导致中国人民将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集中地发泄在传教士及信徒身上,进而引发一系列教案纷争,著名的有贵州教案、扬州教案、天津教案、马神甫事件等,酿成震惊中外的最大规模的仇外、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

综上所述,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特权,是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干涉中国内政、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取得的,同时,又被列强当作争夺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的工具,成为侵华的急先锋;这是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最显著的特征,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相一致的。基督教通过各种各样手段获得在华传教特权,违背了它所宣扬的和平、正义、博爱、慈善等宗旨及反对利用武力传播福音的主张;而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事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为列强侵华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签订,为侵略国家出谋划策,依靠治外法权,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凌驾于中国法律上的太上皇,所有这些,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注释:

- ①②⑤[法]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③④⑦蒋世弟,吴振棣.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Z].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 ⑥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⑨[法]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⑩⑪翦伯赞,郑天挺.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Z].中华书局.
- ⑫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Z].
- ⑬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M].
- ⑭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2册[Z].
- ⑮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Z].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权的攫取

作者: [陈重耕](#)
 作者单位: [邱北县八道哨中学, 云南, 邱北, 663200](#)
 刊名: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WEN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 卷(期): 2003, 16(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卫青心, 黄庆华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1991
2. 蒋世弟, 吴振棣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 1988
3.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1992
4. 卫青心, 黄庆华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1991
5. 翦伯赞, 郑天挺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6.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1册](#)
7. 顾维钧 [外人在华之地位](#)
8.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2册](#)
9. [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

相似文献(10条)

1. 学位论文 [潘敏 基督教女青年会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以基督教女青年会乡村服务事业的考察\(1926—1937\)](#)

2000

妇女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但到目前为止,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学者几乎还没有摆脱革命史的研究框架:那种认为只有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才是中国妇女运动唯一正确道路的观点,还在支配研究者的思想,使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陷入困境。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通过考察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乡村服务事业,展示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推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所探索的另一条非革命化、非政治化的道路。它以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为妇女运动目标,它以指导妇女“自动”的方式来推动妇女运动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当然这条道路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中,不可能求得妇女的完全解放,它的意义在于为作者提供一种真正的妇女运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对当代中国妇女运动可能会有借鉴意义。

2. 期刊论文 [刘金玉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生成探讨——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 25\(1\)](#)

中国近代教会学校是西方传教士搭乘西列强所加给中国清政府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传扬“基督福音”的过程中捆绑兜售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整个近代教会学校的形成过程既是基督教文明对儒家文明的主动攻击和适应的过程,也是儒家文明向基督教文明反抗、屈服和学习的过程。中国近代教会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近代中西文明博弈中取得胜利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也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动力和学习的范型,进而为推动整个儒家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镜鉴。

3. 学位论文 [秦武杰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工业的改良\(1895—1937\)](#) 2009

基督教具有很强的普世性和社会性,十分注重社会服务。十九世纪末,随着社会福音的传播,基督教世俗性的工作逐渐扩展到工业领域。在华基督教以慈善事业为起点,开始了其工业方面的事工,对中国一些贫困教徒进行工艺教育,在一些孤儿院和聋哑院也开设了简单的工艺课程,后来还开办一些工业学校,一些教会大学也增添了工业课程,这些都弥补了中国近代工业和职业教育的不足。基督教还有鉴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恶结果”,设法缓和中国的劳资矛盾,改善劳工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智识,提倡将基督教训应用于工业领域,建立一种基督教的经济制度。

从总体上看,基督教的工业事工显得较为分散,既没有形成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也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实践,有的多是呼吁宣传,舆论倡导。它不像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也不像教育事业那样影响深远。然而,基督教的工业事工,还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对工业的改良和发展以及工业环境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我们详为研究。

本文试图充分利用已刊和未刊的资料,全面考察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特定时间内的工业事工,以此来研究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工业改良,工业改造以及工业环境的优化方面所做的贡献,阐述其在中国工业及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

4. 期刊论文 [刘家峰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论纲——浙江学刊2003, ""\(5\)](#)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源于二十世纪早期来华的农业传教士,到三十年代随着全国乡建运动的发展而达到鼎盛时期,它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受世界基督教乡村运动的影响。基督教乡建运动通过把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合二为一的方法,以最终建立基督化的乡村社会为目标,但它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宗教(教会建设)与世俗(乡村建设)并不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两者的持续张力以及近代恶劣的社会环境最终使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5. 学位论文 [颜白瑜 近代福建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探析](#) 2008

从唐元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差会曾三度传入福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使整个福建福音化,采取了不同的传教策略。这些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教的成败,因此传教策略是研究传教史时必须着重考察的问题。本文选择了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作为该篇论文考查的时间断限,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的传教策略,试图对近代入闽传教士的传教策略的具体表现、转变原因及影响予以勾勒澄清,并作出相应评价。

传教策略指的是传教士为了实现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而制定的各种方案。与唐元之际、明末清初的基督教相比,近代福建基督教各差会所采取的传教策略显得更为灵活多变。这种“变”显然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而这种“变”也为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以近代福建基督教传教策略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分析了近代基督教传教策略转变的表现、转变的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影响。

绪论部分,笔者简单回顾一下国内外在基督教传教策略研究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现状,并对前辈学者们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了一下分类梳理,然后确定了本选题。接下来阐述选择这一选题的动机,交代写作本文时所使用的材料的来源、本文的框架结构及写作本文时所运用指导理论和写作方法。

第二章关于福建基督教的概况本章共有三节内容,在第一节里主要记述元代也里可温教在福建的状况。福建的泉州是元代也里可温教在中国的主教区之一。据考,当时泉州奉教的信徒达一万人左右,但是随着元的覆灭基督教也随之飘散到关外。第二节主要阐述明末清初福建天主教的传播情况。这一时期,在以艾儒略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苦心经营下,福建天主教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696年,教皇意诺爵第十二钦定福建为中国的第四教区。然而,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的爆发,福建天主教活动开始走下坡路。第三节则简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福建的基督教(包括新建和天主教)的情形。

第三章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近代福建基督教的传教策略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在传教对象的选择上,入闽传教士们认为“教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像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于是主要目标是吸引福建下层民众奉教。第二,在传教手段上,主要采取以教育、出版和开办医院等社会活动为媒介的间接传道方式。与元代、明末清初相比,近代基督教传教手段更具丰富多样性。第三,在传教路线上,福建各差会在积极拓展“疆域”的同时,为了保障彼此的利益,相互之间精诚合作,甚至出现了两个差会的礼拜堂轮流主持“礼拜”的画面。第四,在传教士的甄选上,对西来传教士的要求较为严格(不仅要接受正规神学院的教育、具有语言天赋,还需对传教工作怀有较大热忱、拥有坚毅的品格)。除此之外,各差会还积极培养福建本土传教士。

第四章转变的原因近代基督教之所以改变传教策略,这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第一,为了摆脱传教初期的传教困境;第二,随着对福建的了解加深,传教士观念有所转变。在这一章里,笔者主要针对这两个因素进行阐述,对于其它原因由于资料和个人能力有限,没有详加以论述。

第五章传教策略的影响近代福建传教策略的转变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教策略的转变促进了福建教会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全省教徒和教堂数量的增多、传教区域的扩大以及部分福建教会开始走上“自立、自养、自传”的道路。另一方面,传教策略的转变在客观上对福建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教育制度和医疗体系的影响上。

6. 期刊论文 [王丽, Wang-Li 近十年基督教在华活动研究综述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 \(2\)](#)

近十多年来,对基督教(新教)在华活动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视野更加扩大;而且由于吸收了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成果,研究手段亦呈多样性;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也日益增多,本文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评论。

7. 期刊论文 [赵燕玲, 罗韬 浅析中国近代教案的民众心理 - 韶关学院学报 2000, 21 \(1\)](#)

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事件,它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民众心理的角度,就民众对基督教会和传教士侵华行径的仇恨心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心理以及对官员的追随和附和心里三个方面,浅析近代教案产生的原因。

8. 学位论文 [邱芸香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 2004](#)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新教(在中国称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教育机构,是一个含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在中国存在了一百多年,给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教会学校是西方侵略者侵略中国的产物和手段,在运行过程中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但教会学校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如果我们单纯从教育角度来考察其发展规律,可以发现它在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对今天的借鉴意义。最初,传教士办学的目的仅是辅助传教,但是为了能更好地吸引中国学生,扎根中国,进而有效地控制中国的教育权,影响中国社会,教会学校必须与中国人所办的学校进行竞争,因而必须通过调整办学策略,来提高办学质量,如调整课程结构、提高学校级别、严格教学管理等。教会学校很重视教师的培养,采取了许多有特色的措施,建立起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发展了一批名校,培养了许多人才。教师是教育的工作母机,教师素质是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2001年以来,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因为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教师教育,有关教师教育的文章层出不穷,纷纷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80年代后,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越来越多,该文专门挖掘教会学校中的教师教育。该文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教会学校的创设和发展,并分析了其创设与发展的原因;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从教会学校教师的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职前教育中,重点论述教会学校自行培养的教师。第三部分,总结教会学校的教师教育,以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教会学校的教师来源有三个,一是外籍教师(包括西方传教士),二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最主要的来源),三是从中国聘请的教师。这三种不同的来源,决定了他们所受的职前教育各有特点。该文重点介绍第二部分教师,他们在教会学校接受了丰富的西学知识,培养了很高的动手实践能力,奠定了扎实的外语基础,为教会学校的良性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教会学校对教师的职后培训,除了在国内设立机构进行外,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与国外同类学校进行交流。

9. 期刊论文 [程丽红 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中国近代报业和近代社会的影响 - 史学集刊 2000, "" \(3\)](#)

尽管显在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报业的进步乃至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却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它直接影响了近代洋人的办报活动,还表现在它冲破了封建主义限制,把报刊的近代化形式最早传入中国,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同时,它还首开“西学介绍”之风,并把基督教带到东方,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10. 学位论文 [王辉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影响 2008](#)

曾经灿烂辉煌的古代藏书楼,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在保存典籍、传、承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封建文化日趋没落,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思潮日渐兴起。古代藏书楼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古代藏书楼,也因此失去昔日的光环而走向衰落,但它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初衷是向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宣传基督教,但首次来华传教士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传教士不接受;二是因为在“独尊儒术”的国度里,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和反感。总结传教失败的教训后,传教士改变了策略,以宣传西方科技文化等新内容取代直接传教,这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西方文化逐步渗透到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翻译、著述书籍进行图书馆思想启蒙;引进西方文献在中国开办新型图书馆。其开放的办馆思想、注重为读者提供服务的职能、藏书结构的多样化、先进的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西方图书馆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的影响也逐步打开,这些都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韦赫女士兴办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更是对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但是古代藏书楼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它不可能因西方传教士两次来华就简简单单发生变化,它的改变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进行,它与中国的洋务派、维新派和先进知识分子、清政府等因素在不同的层面上相互影响,彼此推进,共同汇成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的交响乐,促成了近代图书馆的产生。

在文献资源共享的今天,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进行探讨,对传教士的作用进行总结与借鉴,对于推动今天的图书馆建设及其现代化进程大有裨益。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wssfgdzkxxxb200301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624aeaf2-25f9-49bd-8d75-9e4d008fae9c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